

再论毛泽东传统文化观中的“认知范式”问题

李文

(广东金融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广州 510521)

摘要: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范式是复合型的,包括人文认知范式、科学认知范式和唯物辩证认知范式,这一特点充分体现在他对中国佛教的认知中。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毛泽东主要基于人文认知范式和科学认知范式对中国佛教加以评价,他从人文认知范式出发,认为“宗教可无,信仰不可少”,从科学认知范式出发则认为宗教是一种迷信。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又从唯物辩证认知范式出发认为佛教存在诸多辩证法的因素。这种复合型的认知范式对新时代持续推进“第二个结合”具有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毛泽东;传统文化;认知范式;“第二个结合”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5)05-0027-08

毛泽东在认知和改造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存在一个复合型认知范式,其中至少包括人文认知范式、科学认知范式和唯物辩证认知范式三种具体形态。笔者曾撰文论证和阐释这一复合型认知范式提法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认为不论在何历史时期,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认知范式都相对稳定,而且是一个多元的复合型认知结构。“三种认知范式并不是完全孤立的,而是互相补充、互为支援的复合型认知系统。”^①之所以提出这一观点,是因为单一的认知范式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和使用边界,而在多元认知范式视域下可以更好地解读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和改造。毫无疑问,这种复合型认知范式在他对中国佛教的认知中显得尤为突出。本文以毛泽东对中国佛教文化的认知和改造为例进一步阐释复合型认知范式的内涵及其对推进“第二个结合”的启示。

一、“宗教可无,信仰不可少”:基于人文认知范式的解读

“宗教可无,信仰不可少”^②是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的话,这句话基本表达了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对宗教的基本看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这一论述中,他把宗教区分为宗教迷信和宗教信仰,就其内在分析逻辑而言,他对宗教的态度既坚持了科学认知范式,也坚持了人文认知范式。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宗教从迷信思想的角度看是非科学的,同时他又充分认识到宗教的人文价值,认为宗教蕴含的信仰精神是不可或缺的。什么是人文认知范式呢?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加以理解。

首先,坚持以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价值理念来审视佛教。早年毛泽东在对传统文化进行评价时认为中国的民众迷信鬼神,迷信强权,完全没有个人,也不知道民主为何物。毛泽东则强调“唯我”和民主。这一认知彰显了毛泽东对待传统文化的认知范式问题,即人文认知范式。毛泽东从人文认知范式出发,对宗教持一种肯定的态度。毛泽东1919年写的《祭母文》明显体现了人文认知范式。这篇祭文不长,却集中反映了青年毛泽东对佛教的认知和看法。其一,“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

收稿日期:2025-04-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专项(22VRC00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4YJA710073);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GD23YXY03)

作者简介:李文(1984—),男,湖南永州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①李文:《毛泽东传统文化观中的“认知范式”探析》,《现代哲学》2024年第4期。

②《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39页。

载。恺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①。在这段祭文中毛泽东接连使用了“博爱”“慈祥”和“爱力”三个概念。就概念的表达形式而言,这三个概念很自然让人联想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的自由、平等、博爱。但是,这里的“博爱”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观念中的“博爱”,换言之,这里的“博爱”是青年毛泽东以一种人文认知范式来理解和表达中国传统佛教思想中的“慈悲”概念。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提倡的“仁爱”,墨家提倡的“兼爱”,佛家提倡的“慈悲”,一定程度上是同一系列的概念。有学者指出:“尽管用了‘博爱’‘爱力’‘慈祥’,其实质仍是讲的‘慈悲’。”^②毛泽东后来在回忆母亲时说道:“我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她可怜穷人,他们在荒年前来讨饭的时候,她常常给他们饭吃。但是,如果我父亲在场,她就不能这样做了。我父亲是不赞成施舍的。我家为了这事多次发生过争吵。”^③毛泽东母亲的慈悲之心由此可见一斑。这方面的事例还有很多,例如:毛泽东评论《聊斋志异》中的《小谢》时讲到“一篇好文章,反映了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人与人的关系应是民主的和平等的”^④。其二,“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谎言,不存欺心”^⑤。毛泽东在这一段祭文中,对自己母亲的品行进行了总结和评价。他这里所提及的“不作谎言,不存欺心”其实是对佛教“不妄语”的具体表达。佛教强调“戒定慧”,佛教徒的修行首先强调的是“戒”,由戒入定而生慧。在佛教的诸多戒律中,“不妄语”是基本的一条。具体而言,不妄语要求世人在现实生活中为人真诚,不欺骗他人。

其次,客观评价佛教在中国哲学史中的地位。这种人文认知范式不仅意味着从传统文化中挖掘与民主、自由和平等相匹配的价值资源,其本身更是一种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的具体表现就是毛泽东充分肯定佛教在中国思想史发展中的地位,同时也强调要尊重佛教的历史文化价值。从理论角度而言,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颇有学术价值的理论问题,那就是佛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问题。关于这一问题,他在其他场合也多次论及。1958年8月21日在北戴河扩大会议讲话中,他说:“《六祖坛经》记载,慧能和尚,不识字,很有学问。在广东传经,主张一切皆空,是彻底的唯心论,但他突出了主观能动性,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大跃进。”^⑥1964年8月18日在一次谈话中,他又说:“很欣赏任继愈讲佛学的那几篇文章,讲唐朝的佛学,没有触及以后的佛学。宋明理学是从唐代的禅宗来的,从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不出入佛道,不对,有佛道,不管它怎么行?”^⑦可见,毛泽东对禅宗在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上的地位是高度肯定的。从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发展角度而言,禅宗对宋明理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不论是张载的唯物主义哲学,还是朱熹和王阳明的唯心主义哲学都受到禅宗的影响。毛泽东对禅宗在中国思想上地位的评价无疑是极为专业和富有见地的。在唐代中期,慧能创立的禅宗成为佛教诸流派中的主流,并且对传统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造成巨大的冲击。面对禅宗带来的挑战,韩愈坚决主张辟佛,以削弱佛教的影响进而维护儒家正统地位。面对外来思想的冲击,韩愈这种简单对抗和排斥的态度显然不能取得成功,但是他激起了儒者们的道统意识。面对这一思想冲击,柳宗元则提倡出入佛道,这为后来宋代理学的创立打开了思想空间。由此可见,毛泽东所说的“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是在对佛教以及中国古代思想史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的科学论断。这不得不让人叹服毛泽东深厚的国学造诣和功力。

最后,强调要尊重佛教的历史文化价值。在毛泽东对佛教的认知中,佛教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也是一种文化。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来,在建筑、雕塑、绘画和书法等方面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

①《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74页。

②王兴国:《毛泽东与佛教》,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

③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94页。

④《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82—83页。

⑤《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74页。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18页。

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90页。

产。如何看待这些佛教文化遗产?不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都强调要保护起来加以研究和学习。1947年10月,毛泽东在转战陕北的征途中来到陕北佳县,参观了白云寺。在参观寺庙的建筑、雕塑、塑像等古迹后,毛泽东说:“这些东西,都是历史文化遗产,要好好保存,不要把它毁坏了。”^①当然这方面的事例有很多。1952年10月,毛泽东在给罗元鲲的信中说道:“新化古寺有所毁损,极为不当,此类各地多有,正由政务院统筹保护之法,故不单独写字,尚祈谅之。”^②1952年12月,中共中央统战部为查询苏南地区破坏寺庙情况给华东局统战部发电报,说江苏有一些佛教徒反映浦东一些名胜寺庙遭受破坏,要求华东局统战部查明真相,如情况属实应立即纠正并作适当处理,并应注意其他地方有无类似情况发生。毛泽东在这份电报的批语中说道:“此件望加衔发给各中央局及各省市统战部加以注意。估计此类事各地皆有。”^③上述事例中,毛泽东都强调了佛教的历史文化价值,这与他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对宗教的基本态度是一致的。

二、“宗教的本质是崇拜超自然力”:基于科学认知范式的解读

从毛泽东认知宗教的历史逻辑而言,他最初受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主要基于人文认知范式对宗教加以观照,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自然科学知识的不断丰富,毛泽东对宗教的认知逐渐兼具了科学认知范式。所谓科学认知范式,就是毛泽东从科学精神的角度去认知和解读宗教现象。其具体的表现有三个方面:其一,基于科学的立场反对宗教迷信;其二,认为宗教的本质是崇拜超自然力,其产生根源是生产力和自然科学的不发达;其三,尝试用自然科学知识来解释生死。

首先,基于自然科学的立场反对封建迷信。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说道:“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④当然,毛泽东在这里说不怕天不怕鬼主要是为了强调民众大联合的力量最强,还没有完全上升到自然科学的角度。但是,在《湘江评论》刊发的其他文章中,可以明显看到这种科学主义的认知倾向。例如:针对雷电电死人的意外事件,毛泽东在《不信科学便死》一文中说道:“这点科学常识,谁也应该晓得。长沙城里的警察,长沙城里三十余万的住民,没一人有闲工夫注意他。有些还说是‘五百蛮雷,上天降罚。’死了还不知死因。可怜!”^⑤这里他显然是以一种科学的态度对传统迷信思想进行了有力的反驳。再如,毛泽东在《婚姻上的迷信问题》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我常研究旧式婚姻所以尚能维持的原故,以为这是由于有一种极大的迷信。”^⑥在毛泽东看来,一个刚出生的人姻缘已定的“婚姻命定说”就是最大的迷信。有趣的是,他还列举了六种具体的小迷信,诸如“合八字”“定庚”“择吉”“发轿”“迎喜神”“拜堂”。当然,从科学认知范式而言,这些婚礼过程中的环节确实有迷信的成分,但是如果从人文认知范式而言,其中的一些仪式和环节也是需要我们尊重和传承的民俗。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仍然坚持从科学理性的视角向农民宣传破除迷信思想,可以说反对封建迷信是贯穿毛泽东一生的基本立场。对于这一基本立场,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有一段经典概括:“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⑦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共产党人可以与宗教徒建立政治上的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但是绝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和宗教教义。

其次,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探讨宗教的本质问题。1938年1月到3月,毛泽东在读《社会学大纲》一书时作出批注:“宗教的本质是崇拜超自然力,认为超自然力支配个人、社会及世界。这完全是由于不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45页。

②《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15页。

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434页。

④《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70页。

⑤《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53页。

⑥《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01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

理解自然力及社会力这个事实而发生的。……生产发达,对自然力逐渐理解的多,宗教发生的第一个根源渐渐失去。然社会的阶级制度确立,社会力仍觉不可理解;加以万物有灵论深入人心,故宗教仍然存在,但依各个特定社会形态而变化了宗教的形式和内容。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生产发达,对自然力与社会力之逐渐理解,哲学也出现了。”^①在毛泽东看来,宗教产生的根源之一是生产的不发达。由于生产不发达,人们对自然界认识不够,产生了对超自然力的精神依赖和崇拜。换言之,科学技术的不发达导致人们无法正确地认识各种自然现象,这就为宗教迷信留下了生存空间。按照这一理解思路,随着人类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科技的进步,宗教产生的基础就会不断瓦解,直至消亡。1957年初,毛泽东倡导百花齐放时,有人认为戏台上不能出现迷信色彩浓厚的鬼戏,毛泽东并不赞同。在毛泽东看来,戏台上之所以会有鬼戏,全然因为群众的需要。既然有观众,就不能采取简单打压取消的方式,而应该通过提高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来消除迷信的影响。所以,在宗教的消亡问题上,毛泽东的回答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和科技。他指出:“宗教在阶级社会更加发展,并为剥削阶级所利用。因之,宗教的消灭,只有在人类消灭了阶级并大大发展了控制自然和社会的能力的时候,才有可能。”^②毛泽东认为随着人类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宗教产生的基础就会不断瓦解。这些论述都体现了毛泽东关于宗教的科学认知范式。

最后,尝试用自然科学的概念范畴来解释生死。生死观无疑是佛教的一个核心议题,早年毛泽东的生死观显然受到佛教灵魂不灭论的影响,这可以从《祭母文》等早期文稿中得到印证。“世界之外有本体,血肉虽死,心灵不死,不在寿命之长短,而在成功之多寡。”^③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在具体论述其生死观的过程中并没有陷入唯心主义的认知逻辑,而是别开生面地引入了自然科学的一些概念范畴。毛泽东说:“人类者,自然物之一也,受自然法则之支配,有生必有死,即自然物有成必有毁之法则。凡自然法则者,有必然性。……且吾人之死,未死也,解散而已。凡自然物不灭,吾人固不灭也。不仅死为未死,即生亦系未生,团聚而已矣。由精神与物质之团聚而为人,及其衰老而遂解散之,有何可惧哉。”^④在这一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的信息:其一,在毛泽东看来,人作为自然物之一,如同花草树木一般遵循自然规律,花开花谢都是再正常不过的自然现象;其二,毛泽东这里使用了“解散”和“团聚”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类似于自然科学中的“分解”和“化合”。也就是说,他尝试从化学的角度来解释人的生死问题,生不过是各种物质“化合”,死则不过是物质的“分解”。无独有偶,毛泽东在《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一文中说:“社会上发生一件事,不要把他小看了。一件事的背后,都有重叠相生的原因。即如‘人死’一件事,有两种解说:一是生理的及物理的,‘年老寿终’属于这一类;一是反生理的及反物理的,‘夭殇’、‘横死’属于这一类。”^⑤在这些关于生死观的早年论述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毛泽东从物理、化学和生理学等自然科学角度解释生死问题的尝试。

值得强调的是,科学认知范式是毛泽东认知中国传统文化一以贯之的原则,并且产生了深远的思想效应。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毛泽东分析中国的中医、音乐、舞蹈和绘画等传统文化要素时,都遵循了科学认知范式。他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说道:“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了这些原理,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我们要西医学中医,道理也就是这样。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一般道理都要学。水是怎么构成的,人是猿变的,世界各国都是相同的。艺术又怎么样呢?中国的音乐、舞蹈、绘画是有道理的,问题是讲不大出来,因为没有多研究。应该学外国的近代的東西,学了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⑥这段论述虽然谈的是学习西方的科学来研究中

①《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14—215页。

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221页。

③《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2页。

④《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1页。

⑤《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76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8页。

国的中医、音乐和绘画等,但是,这些方法原则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样具有深远的启发意义。

三、“佛教还真有些辩证法的味道”:基于唯物辩证认知范式的解读

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毛泽东坚持唯物辩证认知范式,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对宗教加以认知。1938年10月,他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①在他的著作和讲话中,他更是率先垂范,从唯物还是唯心、辩证法还是形而上学以及阶级属性等范畴对佛教加以分析。当然,在他的深层认知逻辑中,不是单一的唯物辩证认知范式,而是兼具人文和科学的复合型认知范式。

首先,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分析佛教的政治经济基础。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论及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时就指出:“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②那么,如何解除束缚在农民身上的这四条绳索呢?毛泽东给出了自己独到的回答。在他看来,当前的农民运动应该把精力集中于对地主的政治斗争,并在推翻地主之后开展经济斗争,以解决农民的土地和其他经济问题。毛泽东得出这一结论遵循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论。在毛泽东看来,这些鬼神系统都是封建经济和政治在观念领域的反映,同时这些鬼神系统反过来又服务于封建的经济和政治。因此,要彻底清除这些鬼神系统的影响,必须彻底变革封建的经济和政治这一基础。“至于家族主义、迷信观念和不正确的男女关系之破坏,乃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以后自然而然的结果。”^③因此,他在破除宗教迷信问题上明确反对用强力,因为如果不彻底动摇这些迷信赖以存在的政治和经济基础,生硬地破除只会适得其反。此时,毛泽东已经尝试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来思考传统文化的问题,如家族主义、迷信观念和不正确的男女关系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和政治基础之上的,只要经济和政治层面的革命获得成功,观念领域的变革就具有必然性。问题的另一面,在政治和经济斗争取得胜利之后迷信观念是否就必然会消除呢?回答是否定的。随着人类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科技的进步,人类对于自然的认识不断深化,这必然消解宗教产生的根源。但是,由于阶级社会的存在和灵魂不灭论的影响,宗教仍然会存在。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角而言,这就涉及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体现在社会意识具有继承性,这种继承性既有好的传统的继承,也有不好的传统的继承。

其次,基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分析宗教的阶级属性。1930年5月,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指出,地主阶级施舍土地给寺庙,为寺庙的和尚提供物质方面的供给,是因为佛教是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的宗教。他说道:“寺产都是大地主‘施’出的,施了田的大地主,叫做‘施主’。大地主为什么施田地给和尚呢?因为佛教是大地主阶级利用的宗教,大地主为了‘修子修孙修自己’,所以施田给和尚。”^④毛泽东基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认为封建宗教是束缚民众的精神枷锁,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意识形态。但是,毛泽东对宗教的阶级分析并没有局限于此,而是别开生面。1955年3月8日,他在同达赖喇嘛谈话时说:“你们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受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有共同之处的。”^⑤在这一谈话中,他对宗教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从统一战线的现实需要出发,认为佛教的基本教义与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存在一定的契合性,都是为了求得民众的幸福。毛泽东还进一步认为佛经也并不全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也有为劳动人民服务的佛教经典,这与他之前对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页。

④《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0页。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0页。

宗教阶级属性的整体性认识显然有了进步和发展。1959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同班禅大师谈话时说:“我不大懂佛经,但觉佛经也是有区别的。有上层的佛经,也有劳动人民的佛经,如唐朝时六祖(慧能)的佛经《法宝坛经》就是劳动人民的。”^①毛泽东对佛经阶级属性一分为二的分析是独树一帜的,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和分析方法,反映了他在佛教认知方面的唯物辩证认知范式。

最后,基于唯物辩证法的视角分析佛教的辩证法因素。佛教是唯心主义的,但其中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因素。如何看待这些因素?毛泽东基于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原则对这些因素进行了分析,抑或批评抑或赞同。《矛盾论》中,毛泽东在论及矛盾的转化是具体的和现实的转化这一部分内容时,就对神话故事中的变化进行了批判。在他看来,诸如《西游记》中孙悟空七十二变、《聊斋志异》中各种鬼狐变人的故事等,这些神话故事中描述的各种千变万化只是无数现实矛盾的变化在人们头脑中的幼稚的和主观的幻想,并不是具体的矛盾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变化。他总结道:“这就是说,神话或童话中矛盾构成的诸方面,并不是具体的同一性,只是幻想的同一性。科学地反映现实变化的同一性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②不难看出,毛泽东对神话故事中的所谓矛盾变化这一因素持否定的批判态度。根据《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的记录,毛泽东在读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第五章“隋唐佛教宗派哲学(下)”时,针对任继愈对华严宗的评价,他在旁边批注“何其正确”^③。在任继愈看来,华严宗以唯心主义世界观对待事物,一切都被歪曲、颠倒了,但是它较为注意范畴的阐明,如涉及个别与一般、同一与差别、发生与消灭、时间与空间、本质与现象等。从认识论上说,这是一个发展。毛泽东对任继愈的这些观点总体是持赞同态度的。他在“华严宗总算有一点辩证法观点”下面划了一条横线,在“把联系绝对化”下面划了两条横线以作强调。由此观之,从唯物辩证的认知范式出发,毛泽东也认同佛教确实是有辩证法的因素的,但是其理论特质是唯心的。

在此,仍要强调一点,在三大认知范式中,唯物辩证认知范式是毛泽东认知佛教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人文和科学认知范式则是不可或缺的有益补充和支援。三种认知范式共同作用于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认知过程,这可以从毛泽东对儒家、道家和墨家等其他思想流派的分析中得到佐证。基于对宗教的多元认知范式,毛泽东在现实的宗教政策问题上强调宗教信仰自由。在特定场合他还提倡共产主义者研究佛教经典,以便更好地开展群众工作。当然,毛泽东提倡马克思主义者研究佛教经典并不是从一般意义来谈的,他所强调的研究佛教经典主要是从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的需要和从群众工作的实际需要出发的。这跟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文化科学性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他在文化的科学性论述中讲得很清楚,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观点,同宗教的唯心主义观点是根本对立的,但是可以与宗教的信仰者建立政治上的统一战线。也就是说,在多元认知范式的思维逻辑下,毛泽东认为宗教迷信和宗教信仰是两分的,政治和宗教也是两分的。

四、当代启示

前文主要探讨了在三大认知范式下毛泽东对佛教的一些论述,之所以提出这一认知范式的问题,是为了更好地解读毛泽东传统文化观。“宗教可无,信仰不可少”的观点蕴涵了两种认知范式。毛泽东对宗教消亡条件的分析同样存在两种认知范式。这方面的事例有很多,如:毛泽东对大同是志向还是虚幻的“矛盾”评价,对中庸是辩证还是折中的“矛盾”评价,对老子是唯物还是唯心的“矛盾”评价,等等。这些理论问题其实都可以在复合型认知范式理论视角下得到更为合理的解释。以毛泽东的佛教观为例,我们可以更为直观和感性地体悟他认知和改造传统文化的有益尝试,这些尝试对新时代持续推进“第二个结合”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

①王兴国:《毛泽东与佛教》,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88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1页。

③《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98页。

首先,人文认知范式的效力积蓄了“第二个结合”的人文价值底蕴。从毛泽东认知佛教的三大认知范式而言,人文认知范式在时序上具有优先性。如前文所述,毛泽东在接受自然科学知识以及在完成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向之前,人文认知范式的效力就突显出来。他尝试从佛教思想中开凿出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人文价值理念,之后又充分肯定佛教在中国思想史发展中的地位,同时也强调要尊重佛教的历史文化价值。这些人文价值理念的开凿和人文精神的凸显为毛泽东后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奠定了丰厚的人文价值底蕴。例如:他从佛教的普度众生思想中开凿出博爱的人文价值理念,从佛教中看到了信仰的价值。少年毛泽东受到母亲信仰佛教的影响,思想观念深处早就种下了慈悲的种子。在谈及立志问题时,他就明确提出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世人。从《祭母文》以及毛泽东对母亲的回忆中,不难发现佛教的慈悲情怀对他的影响。毛泽东一生同情弱者,见不得人民群众受苦受难,立志为实现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奔走呼告。可以说,他一生奋斗的目标就是为社会底层民众求得解放。毛泽东在“老三篇”中概括提出的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品质,都与佛教的人文价值有着一定的精神联系。换言之,这些精神品质是毛泽东基于深厚的佛教人文价值底蕴推进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结果。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理念同佛教的普度众生理念进行了有机的融合。尤为重要的一点,在认知和改造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这种人文认知范式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不可缺失的。

其次,科学认知范式的功效揭示了“第二个结合”的话语叙述结构。毛泽东从科学认知范式出发反对封建迷信,并尝试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去解读宗教的本质和生死观。后来他又特别强调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对研究中国的中医、音乐和绘画的重要性。毛泽东为何如此强调自然科学的重要性?1949年,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道:“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①不难看出,毛泽东是从求得民族解放和复兴的现实角度来思考这一问题的。但是,如果我们把问题引向深处,他如此强调用自然科学研究和阐释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这背后也蕴涵了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和发展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医、音乐和绘画等要素要走向现代,离不开自然科学概念范畴的“点缀”和“包装”,更为深层次的问题是,这些“点缀”和“包装”会建构起传统文化的全球性话语叙事能力。换言之,中国传统文化要从“内销”转“出口”也要学点“西洋话”。如何建构起我们党的创新理论的全球性话语叙事能力,进而提高对外宣传效能?这无疑是新时代推进“第二个结合”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有学者曾指出,“第二个结合”其实也蕴含了“第三个结合”的问题,即如何处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同西方文明的关系。这一问题是值得深思的,而科学认知范式或许已经提供了答案。我们也要指出,当我们遵循科学认知范式对传统文化加以观照时,可能会产生一些认知偏差。例如毛泽东基于科学的立场分析传统婚俗过程中的一些仪式和环节时,认为这些都是“大迷信”下的“小迷信”,这一论断显然值得讨论。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这就需要人文认知范式介入了,这也是我们强调复合型认知范式重要性的原因。

最后,唯物辩证认知范式的效用筑牢了“第二个结合”的理论基石。毛泽东从唯物辩证认知范式出发认为佛教在解除民众疾苦的目标方面与共产党人存在契合之处,并尝试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去挖掘和解读佛教中的一些辩证法因素。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佛教的这些契合性要素是如何产生的呢?答案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毛泽东遵循唯物辩证认知范式,从唯物还是唯心,辩证还是形而上学等概念范畴对佛教进行审视。这种契合构筑起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理论基础。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不仅尝试从理论维度挖掘和解读这些契合的因素,更是在实践维度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佛教蕴涵的优秀价值理念的结合。例如:毛泽东把佛教的“大雄”精神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9—1470页。

性和革命性特质结合在一起,铸就了中国共产党人勇于创新 and 不怕牺牲的精神品格。毫无疑问,毛泽东波澜壮阔的一生就生动地诠释了这种精神品格。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反其道而用之,探索出一条不同于俄国的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提出要实现“第二次结合”,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些事例足以说明,在他的思维深层有着一种独特的冲决罗网的批判精神。不论是在治学还是在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探索中,他之所以能“自我主张”有所创见,从思维方式而言原因或许就在于此。20世纪50年代,他提出“五不怕”精神,即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这更是对这种大雄和大无畏精神的真实写照。可以说,以“大无畏”精神去实践普度众生的“大雄”人格,是毛泽东所追求的人格理想的最高境界。总体而言,佛教的这种大雄精神给予毛泽东的影响是积极的,这种大无畏精神在革命年代为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支撑和动力。在革命年代取得革命的成功需要这种冲决一切罗网的决然意志,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同样需要这种决然意志去打破常规和束缚,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

Rediscussing the Problem of “Cognitive Paradigm” in Mao Zedong’s View of Traditional Culture

LI Wen

(School of Marxism,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Guangzhou 510521, China)

Abstract: In Mao Zedong’s cogni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re exists a compound cognitive paradigm, namely the humanistic cognitive paradigm, the scientific cognitive paradigm, and the materialist dialectical cognitive paradigm. This compound cognitive paradigm is particularly prominent in his cognition of Buddhism. Before becoming a Marxist, he mainly evaluated Buddhism based on the humanistic cognitive paradigm and the scientific cognitive paradig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umanistic cognitive paradigm, he believed that “religion can be dispensed with, but belief is indispensab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cientific cognitive paradigm, he regarded religion as a form of superstition. After becoming a Marxist, he approached Buddhism from the materialist dialectical cognitive paradigm, believing that Buddhism contains many dialectical elements. This compound cognitive paradigm has important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for continuously promoting the “second combination”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Mao Zedong; traditional culture; cognitive paradigm; “second combination”

(责任校对 唐尧)